

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之結構新探

江江明

摘要

杜甫在律體方面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一向爲人所津津樂道。〈詠懷古蹟〉五首爲同題聯章之組詩，就其形式而言，是屬於近體律詩。並以同題命名的方式，書寫詩人關照歷史時所發出的興寄與感懷。魏晉以來的詠懷作品，選擇以聯章組詩的方式呈現的，不乏其人；代表的如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以聯章形式所呈現之「詠懷詩」，在形式上突顯出詩歌藝術表現的嚴密與複雜性，本文將試以杜甫之〈詠懷古蹟〉五首，並由詩中所呈現之敘事性角度切入，探討其結構義涵，及當中所呈現之特殊藝術手法與詩人之借題抒事的際遇感懷。

【關鍵詞】 聯章組詩 轉喻性 隱喻性 敘述結構 敘事性的連接

壹、前言

杜甫之〈詠懷古蹟〉五首，就性質上來說，與〈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等同樣為其近體詩之代表作。盧世樞認為「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蹟〉五首，此乃七言律命脈根柢」¹，而相較於〈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的討論確實是較為稀少的。〈詠懷古蹟〉五首作於唐代宗大曆元年（西元766年），是時杜甫於夔州寓居，因受到都督柏茂琳的禮遇，生活上較為安定。而杜甫一生中許多重要詩作，亦在此時完成。

杜甫在律體方面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一向為人所津津樂道。〈詠懷古蹟〉五首為同題聯章之組詩，就其形式而言，是屬於近體律詩。並以同題命名的方式，書寫詩人關照歷史時所發出的興寄與感懷。魏晉以來的詠懷作品，選擇以聯章組詩的方式呈現的，不乏其人；代表的如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以聯章形式所呈現之「詠懷詩」，在形式上突顯出詩歌藝術表現的嚴密與複雜性，本文將試以杜甫之〈詠懷古蹟〉五首，並由詩中所呈現之敘事性角度切入，探討其結構義涵，及當中所呈現之特殊藝術手法與詩人之借題抒事的際遇感懷。

貳、魏晉至唐之「聯章詠懷」詩作

魏晉以來的政治環境，在歷來的朝代推移中，可說是極端詭譎與多變的。東漢衰亡以後，曹魏等政治集團開始崛起，彼此之間相互為敵。三國鼎立的局面在蜀、吳相繼宣告失敗後，以曹魏取而代之為中心。正始元年（西元239年），曹芳繼位，司馬家族與曹魏之間的鬥爭全面開展。這樣混亂政治局面，一直持續到咸熙二年²（西元265年），司馬昭死，其子司馬炎廢魏主曹奂，改國號晉，政局上的不安與動輒才正式告一段落。

時代的政局變化，無可避免的影響文學創作的表達與思想。魏晉的政治環境複雜，詩歌的創作在這樣的時代中也發展出極為繁複的形式與思想。文人們避諱

¹ 《杜詩詳注》第二卷，清·仇兆鰲注，頁1508，里仁書局，台北，民國六十九年。

² 《魏晉南北朝史》，王仲勞著，頁134，仲信出版社，台北。（無標明出版年月）

談論現實政治，轉而投入遁世的詩歌吟詠，這使得此一時期的玄言詩及田園、山水等詩得到了高度發展。而以詠史類型作為書寫寄託的「詠史詩」或「詠懷詩」，同樣也因政治環境的因素，在魏晉時期開展出一個的新局面。

魏晉時期最早題名為「詠懷」的聯章組詩代表作，當推阮籍的四言《詠懷詩》十三首及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考察阮籍的四言「詠懷詩」十三首，可發現其詩作帶有強烈的個人抒懷情感。以及受屈原辭賦傳統影響之痕跡。如：「被服蕙蘭，思從二女。適彼湘沅，幽靈聽微」³等語。而其整體涵義亦是偏向強調象徵式的抒情性。魏晉詩歌的象徵義涵普遍來說較其他朝代更為複雜深沉，這與當時政治局勢影響有密切的關聯。相較於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後者的結構則更加擴大。而借用詠楚國之事曲折反映當世，更是開展了純粹詠史與抒懷之外「詠懷」的特殊意義。羅錫詩與夏晴編著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提及阮籍之五言《詠懷詩》八十二首時曾說到：

《詠懷》純粹是文人化的抒情詩，它已明顯突破了樂府民歌的侷限，從敘事走向抒情，從著重反映客觀到更多地抒發內心的感情，它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形式……。⁴

若純粹就聯章的形式來看，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並不是最早的聯章詩體，但是若以抒懷喻志主題來看，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確實具其開創性意義，這樣的意義是立基在以「喻志」為中心聯章詩體結構上。阮籍之後，繼之以聯章詩體方式詠懷抒發的作品，尚有左思的《詠史詩》八首。雖題名為「詠史」之作，但實際上卻呈現出其強烈的個人感懷。「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這正是詩人眼中最深沉與荒涼的世態。左思的《詠史詩》跳脫了班固以來《詠史詩》的呆板與純敘事性，轉而在詩作中呈現出交織歷史象徵與個人感懷的情感。這樣的聯章詠懷詩體，基本上已經趨於成熟。左思以後，晉人張翼亦作《詠懷詩》三首。張翼的聯章《詠懷詩》不似阮籍與左思偏重歷史象徵與個人情感的交錯參雜，而是以崇尚老莊思想為出發。其《詠懷詩》第三首中曾出現「拊卷從老語，揮綸與莊詠」的詩句，由此可見一般。與張翼同樣偏向玄言式的詠懷聯章詩作，尚有支遁

³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遼欽立輯校，頁495，木鐸出版社，台北，民國七十一年。

⁴ 《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羅錫詩、夏晴編著，頁41，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1999年一月。

的《詠懷》五首⁵，類似這樣聯章詩作的詠懷作品，基本上較缺乏傳統文人對於歷史人物象徵的觸發，而是傾向於魏晉好談老莊的時代風氣。而綜觀晉代較具文人詠懷之內在精神的聯章詩作，東晉陶淵明的《雜詩》二十首⁶及《詠貧士》七首⁷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雜詩》二十首的文人抒情感懷十分強烈，並以聯章的方式呈現其嚴密之結構。但是詩作中文人賦予歷史的象徵意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詩人為中心的時代生存孤寂之感。而《詠貧士》七首則與《雜詩》二十首性質相近。觀察陶淵明所作之聯章詠懷詩作，其中以敘事性相連接的結構十分明顯，這樣的敘事性連接基本上是圍繞著個人抒懷的命題進行。到了庾信的《擬詠懷》二十七首，則表現出詠懷詩「以史喻志」的歷史文人感懷。《擬詠懷》二十七首是庾信晚年的作品，內容呈現出詩人飄零至異地的悲傷與沉痛。詩中並使用多種豐富象徵交織。以文人抒懷的聯章組詩來看，庾信的《擬詠懷》二十七首繼承了阮籍以來的詠懷抒情傳統，並確立了完整詠懷聯章形式之詩體，在抒懷的過程以歷史人物（或事件）之象徵反映出更深層的個人情感。唐以後以聯章組詩的方式「以史喻志」的重要作品，尚有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⁸。《古風》五十九首在本質上似乎較庾信《擬詠懷》二十七首更接近阮籍的詠懷詩作，無論當中所呈現的歷史象徵，或是諷刺時政的意義，《古風》五十九首的精神可說與阮籍的詠懷詩作十分相近。到了杜甫，則發展出專以律詩為宗的聯章詠懷之作。以下，本文將試析杜甫之〈詠懷古蹟〉五首，並以其結構義涵為探討對象，進一步考察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之敘事性與詩歌象徵意義。

參、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之結構考察

詩是詩人表達內在情境以及回溯個人生命的藝術呈現，在這樣的藝術表達過程中，最直接所使用的工具便是「語言」。詩的語言不同於一般日常性的語言，它不以「單純的傳達」為目的，而是強調其抒情性質，並以符號本身強烈自指性

⁵ 《中國歷代詩歌大要與作品選析》下冊，張雙英著，頁609，國立編譯館主編，新文豐出版社印行，台北，民國八十五年十月。

⁶ 同註3，頁1005。

⁷ 同前註，頁1008。

⁸ 《李白集校注》第一冊，瞿蛻園等校注，頁477。里仁書局出版 民國七十年。

使詩的語言達到藝術化的效果。因此，就其語言性質的內部規律來看，詩的複雜性遠遠高過一般性的語言問題。羅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在《符號學與文學》第三章〈詩歌文本的符號學〉中曾說到：

由於詩歌表達省略性質所造成的一些因素（敘述性的、戲劇性的、演說性的、個人性的因素）的缺乏，我們必須掌握一些技巧以提供這些欠缺的因素。……

一首詩是同其他本文相聯繫的一個本子，對它的解釋，需要有一個掌握技巧的讀者的積極參與。⁹

詩所包含的複雜性，一方面在於其語言之外的敘述性，一方面則包含詩本身的規律。先不論詩歌的音律及聲調的問題，而單就詩的語言組合方式來說，這樣的規律所包含的主要問題在於語言「橫向組合」¹⁰及「縱向聚合」¹¹的選擇性。近體詩發展到唐代，形式上已臻完備，而詩作本身的藝術性，亦隨著唐代詩歌創作的盛風而隨之提昇。傳統探討詩歌結構的方式，主要以「起承轉合」的章法結構作為說明重心。但若以詩的「語言藝術」本質來看，這樣的探討似乎不足以完全說明詩的結構要素。因此，以下本文將是以不同的文學批評理論視域，考察杜甫之〈詠懷古蹟〉五首，企圖釐清其文本之結構問題，在章法分析的傳統結構說明之外，探討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之深層結構及相關敘事性問題。

一、「隱喻」與「轉喻」的結構變化

雅各布森（R. Jakobson）在〈隱喻與轉喻的兩極〉¹²一文中提及詩歌藝術性的重要特徵，認為所有的「話語段」（discourse）¹³都是透過「隱喻」¹⁴及「轉喻」

⁹ 《符號學與文學》，羅伯特·司格勒斯著，譚一明審校，頁55，結構群出版社，台北，1989年。

¹⁰ 《文學符號學》，趙毅恆著，頁150，

¹¹ 同前註，頁150。

¹² 《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伍蠡甫、胡經之主編，頁430，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87年初版。

¹³ 同前註，頁430。

¹⁴ 同前註，頁430。

¹⁵這兩種過程來完成的。前者強調字句選擇時替代的「相似性」，後者則強調其字句連結的「鄰近性」。將以上這些原則投射到字句組合段中加以選擇，並透過作者的文學思維考量，最終則形成詩的藝術表現。雅各布森認為，某些文學形式所具備的「轉喻性」或「隱喻性」的程度並不相同，以詩歌為例，他認為俄國抒情詩中「佔據優勢地位的是隱喻結構」，而英雄史詩裡則以轉喻手法為主。換句話說，雅各布森認為詩歌中以「鄰近性」表達主題的作品，其所呈現之「轉喻性」也就愈強。史詩中以「敘事性」相接連的情況很多，廣義上來說就是一種轉喻結構。回歸到文本的考察，杜甫在〈詠懷古蹟〉五首中分別吟詠了幾個重要的歷史人物，那麼〈詠懷古蹟〉在結構上所形成的樣式是否也具備了類似「史詩」的轉喻結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針對文本作一相關考察。〈詠懷古蹟〉五首中，杜甫用聯章組詩的方式，以「詠懷」為命題，並分別以五首律體來表現此一命題。以下我們將五首之結構分別單獨考察，並試析其結構義涵。杜甫〈詠懷古蹟〉第一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16

首聯「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以對比的方式呈現詩人於此一時空下的生存狀態，「支離」與「漂泊」皆是對生命無所寄託所抒發的流離之感；而生命無從皈依，處在廣大的宇宙空間向度中，更顯得其渺小與飄忽。因此「風塵際」與「天地間」基本上是承接「支離東北」與「漂泊西南」的不安定感而言。從句式連接上來說是轉喻性較強的。但是這樣的「轉喻性」對應的是以「詠懷」為中心的主要命題。接著由詩人個人主觀的生存意識，投射到外在客觀景物的摹寫，「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兩句寫景，「三峽樓台」與「五溪衣服」本是單純的景物，但使用「淹」與「共」連接以下的「日月」與「雲山」，造成詩句中誇大與震盪的對比效果，從而突顯出景物的壯觀。頷聯兩句寫景，結構上承首聯意識由詩人自身主觀觀照出發，因此其「轉喻性」亦是以「詠懷」為中心主體的。接下來頸聯與尾聯「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生平

¹⁵ 同前註，頁430

¹⁶ 同註一，頁1499。

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由詩人抒懷的自我意識，轉而以「敘史」的方式吟詠歷史人物庾信。就結構上來說，亦是偏向於「轉喻性」，這樣的轉喻性基本上不以抒懷為主，而是具有「敘事」的連續性。並且，這樣的「敘事性」是以「歷史人物」庾信為中心。緊接著〈詠懷古蹟〉第二首：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17

相較於〈詠懷古蹟〉第一首將所詠歷史人物置於詩的後半部結構，第二首則於首聯即點明全詩所詠之中心人物「宋玉」，「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上下兩句，結構來說是以上下承接的方式進行，因此總的來說，首聯兩句敘事性連接大過於「對比性」。由詩人主觀出發，在草木飄零的季節體會到宋玉悲傷的心情，而宋玉獨特的內在生命情境，亦是詩人心中所嚮往的典範。就其結構而言，轉喻性較強。頷聯「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兩句承接著懷想宋玉的心情，並將之投射到外在生存時空中，繼而發出「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慨。頷聯的轉喻性基本上是以「感懷」為主，因此是由詩人主觀的感受與體驗出發。接著頸聯「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亦是詩人遙想歷史前人的感懷抒發。江山故宅的舊址仍在，空留下宋玉的一代文名。而那些詩賦中所描寫的雲雨荒台之景，難道不過是詩人的一場夢境而已？然而這樣的寂寥，遠遠不及改朝換代的時代推移，尾聯「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正是連接著頸聯的感懷而來，並以一強烈的對比方式呈現其詩人傷古懷今的虛無飄渺之感。〈詠懷古蹟〉第二首整體結構以感懷宋玉最為全詩主體，並以史事敘述前後接連。就形式上來說亦是偏重轉喻性。接下來是〈詠懷古蹟〉第三首：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此中論。

18

¹⁷ 同前註，頁1501。

¹⁸ 同前註，頁1502。

首聯「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以動態的方式呈現出奔騰壯闊的風物景緻，並於第二句點明欲詠歷史人物昭君出生地的故址。接著繼續以敘述性的方式說明歷史中昭君的遭遇。「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由詩人主觀的眼光來看，當年在黃沙滾滾中辭別漢宮，遠赴胡地和親的昭君，如今在歷史這條洪流中所剩下的又是什麼呢？無非只是夕陽西下，荒草墳台的寂寞孤獨。由昭君出生之故址，接著敘述其歷史中所呈現的遭遇。並在「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一聯中說明其潔身自好，不願與世同污的心情。這幾句在結構上總的而言，具有史詩性質的敘述關聯，因此具有轉喻性。尾聯「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此中論。」，詩人感懷昭君當日所受之不平待遇，以自身主觀意識出發，慨嘆其「分明怨恨」的入胡心境。〈詠懷古蹟〉第三首的敘述性連接較前兩首更強烈，因為就其詩的整體而言，幾乎每一句都與詠懷昭君之主題相接連，因此，就全詩的結構來說，〈詠懷古蹟〉第三首的轉喻性質更專一集中的表現詠懷「昭君」。不似第一首之轉喻性質，在前半部的結構是針對詩人自身的遭遇詠懷。後半部才回歸到所詠詩人庾信。

接著是〈詠懷古蹟〉第四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19

首聯「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即點明所詠人物劉備所在之故址，以敘述歷史的方式說明劉備當年在蜀國的舊事，且上下兩句有相承接的敘事性關聯。「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主要是情景描述，而這樣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蜀地所在故址的景色而言，因此，亦未脫離前後相連的敘事性。詩人在無人的山中遙想當日蜀國的景況，昔日的宮殿，今日已不復存，只剩下山林中人跡罕至的寺廟了。「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承接頷聯繼續寫景，並以對比性的方式呈現所在地的離世狀態。上句「古廟杉松」點出蜀地故跡的情景，歲暮時節，村落中平日農忙的老翁，如今則準備過冬。頷聯與頸聯四句皆以敘景為主，結構上來說是以客觀方式敘述古蹟之景。故轉喻性較強。

末聯「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又將焦點回歸到歷史，「武侯

¹⁹ 同前註，頁1505。

祠」是諸葛亮廟，詩人吟詠蜀地風物，不能不聯想到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相知的君臣之情。而武侯祠所在位置與蜀國舊址相鄰近，後世瞻仰此一古蹟時，必定也想起昔日兩人君臣相交的感情吧。末聯由頸聯的「寫景」轉入敘事性的感懷抒發，在結構與首聯相呼應。〈詠懷古蹟〉第四首雖以詠蜀地舊跡為主，表面上是以劉備為敘事中心作為開展，但實際上則隱含了詩人對於諸葛亮的評價與歷史認知。因此緊接著在第五首，杜甫這樣寫到：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20

杜甫在詩中提及諸葛亮的次數很多，諸葛亮在其詩中確實呈現特殊的涵義，這樣的涵義除了詩人對於此一歷史人物的評價，尚存在詩人之個人抒情寄託。這裡我們先不論這方面的問題，而將焦點對準詩作本身的結構進行分析。首聯「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與第四首相同，直接點明欲詠之歷史人物。諸葛亮的名聲永垂千古，至今仍留下其赤誠忠心的清澈形象。頷聯「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就一方面就歷史的三國情勢說明諸葛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將詩人主觀的崇敬之情投射於詩作中，認為諸葛亮以其過人之才，在羽扇綸巾笑談間，便成就了三分天下之局勢。「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在三國勢局彼此暗潮洶湧的競爭中，足見諸葛亮堪比伊呂的治國之才。且若時勢允許而平定天下，那麼蕭何、曹參等歷史名相，都要因之遜色。頷聯語頸聯的敘述性偏重於作者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並與歷史中其他人物並峙，突顯出詩人對於諸葛亮生命才情的欣賞。末聯「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感嘆諸葛亮的時不我予，即使「志決身殲」，仍然無法挽救漢祚不復的時勢。觀察此首詩整體之結構，其敘述性皆圍繞「諸葛亮」此一歷史人物開展，與〈詠懷古蹟〉第三首一致，傾向於史詩性質的偏轉喻性。

綜觀〈詠懷古蹟〉五首，每一首皆以人物為詠懷中心，雖標明為「詠懷古蹟」，但實際上結構偏重於古蹟詠懷的寫景，只有第四首。其他皆是以所詠歷史人物作為詩中所呈現之主要敘述性。若以單首的結構來說，幾乎全都是偏重於轉喻性的敘述結構。然而以「詠懷古蹟」為中心主題，若分析其聯章的結構，並將

²⁰ 同前註，頁1506。

詩作做一整體性之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單首分別具「轉喻性」的述史或述人之「詠懷詩」，整體而言則寄託了詩人的感懷於其中。這樣的感懷是以「隱喻」的方式進行。在偏重轉喻性的敘述外衣下，投射了作者巨大的個人寂寞。這樣的寂寞基本上是以「歷史之特定人物」為象徵。〈詠懷古蹟〉五首分別吟詠了庾信、昭君、宋玉、諸葛亮等人，而這些特定之歷史人物，反映了詩人對於自身遭遇的傷懷，並透過這些歷史人物在全詩中開展，呈現詩人賦予其特殊的象徵意義。由此使得〈詠懷古蹟〉五首之整體顯現出強烈的「隱喻性」。且這樣的隱喻性是詩人在選擇歷史人物象徵時所賦予的。

因此，相較於單純「史詩」的偏重轉喻性的結構，「詠懷」所呈現的結構性，不單純只是以敘述性相連接，而是具有其更複雜兩深層的「隱喻性」，這樣的隱喻性，隱含在作者賦予歷史人物象徵意義(或者歷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之下，換句話說，「詠懷」所建立的藝術深刻性，在於其結構的複雜與非單一。這樣的複雜同時包含了「隱喻性」與「轉喻性」，既不是單純的「史詩」，也不是單純的「抒情」，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特殊結構。〈詠懷古蹟〉五首的結構基本上是具有這樣的傾向的。這使得詩作本身呈現出的藝術性，相較於單純敘述性連接的「史詩」或隱喻式的「抒情詩」，顯得更加的複雜與深邃。

二、以史喻志的內在深化

唐以來的律詩發展，到了杜甫，可說達到新的美學境界，在近體詩諸多詩法限制的標準之下，杜甫以其嚴密完整的文字技巧及深刻之思想，將律詩推向一新的藝術境界。趙謙《唐七律藝術史》將杜甫對於律詩的貢獻作出以下分析：

他認真吸取前代和同時代人七律的創作經驗，對七律形式的發展作出了三大貢獻：首創七排，首創拗律，首創聯章。²¹

「聯章」是杜甫律詩的獨創性，這樣的獨創就形式上的意義來說，更加深刻與完整的表達詩人欲詠之事。以某一主題為中心，並以敘事性圍繞此中心主題加以陳述。「聯章」的結構比一般單一題詠之詩複雜，因為它的結構必須被限定在某一命題範圍。在起承的結構轉換中，「聯章結構」比單純的詩體更容易出現重

²¹ 《唐七律藝術史》，趙謙著，頁79，文津出版社，台北，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出版。

複性的問題。但相對的，「聯章結構」亦有其優勢。它的優勢在於可使詩人在表現命題思想時得以一種反覆的形式演出其所欲表達之主題，並在敘事性的連接下，達到更進一步的藝術深化效果。〈詠懷古蹟〉五首以七律聯章的方式，在五首中分別吟詠了庾信、宋玉、昭君、劉備、諸葛亮等人。因此〈詠懷古蹟〉五首基本上是在「詠懷」此一大命題下又細分了五個小命題。五個小命題分別呈現了詩人五種對於生命感嘆的情懷。且這樣的感嘆情懷符合於「詠懷」的詩作命題。

跳脫純粹外在形式的探討，〈詠懷古蹟〉五首除了具有七律聯章的外在形式之外，詩人賦予其整體的結構意義正如前文曾經提及的，不是單純「史詩式」的敘述性連結偏轉喻結構，也不是單純的「抒情詩」偏重隱喻性，而是界於兩者之間。相較於單純抒情性質的詠懷詩作，杜甫的〈詠懷古蹟〉五首的特殊性在於其「以史喻志」的內在深化。以歷史人物的象徵作為詠懷的對象主體，並在吟詠的過程中，投射詩人主觀抒情，由此使得詠懷不單只是詩人個體內在的情感抒發，亦交錯了歷史過往的蒼茫與寂寞。而歷史人物的象徵意義亦深化詩人內在情緒的表現。〈詠懷古蹟〉五首中的第一首詠懷庾信，杜甫發出「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感嘆，這樣的感嘆，就詠懷庾信的小命題而言，是針對庾信的生平與遭遇所進行的書寫。然而就〈詠懷古蹟〉五首整體而言，「支離」與「漂泊」所指的何嘗不也是詩人自身的境遇呢？第二首詠宋玉故跡，「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更是詩人強烈的個人抒懷表現。庾信與宋玉同樣是詩人，他們以文學見證了時代，見證了生命的寂寥。杜甫在詠懷兩人時，對於這樣的詩人身分似乎有著某種熟悉感。而透過呈現此二人的歷史身份象徵，亦體現了杜甫與之相同的寂寞。同樣的，〈詠懷古蹟〉第三首詠昭君之作，亦隱喻了杜甫不為時代所了解的惆悵心境。昭君「一去紫臺連朔漠」的孤寂，也正是詩人不為世用和背離時代的孤寂。而〈詠懷古蹟〉第四首和第五首，則承接第三首的感懷，說明詩人崇敬的歷史人物諸葛亮，因劉備知遇而一展長才，隱隱透露了詩人對於明君知遇的歆羨。然而即使有劉備的知遇，諸葛亮堪比伊呂的輔國之才，終究難力挽漢世已頹的狂瀾。透過以歷史人物作為象徵意義的隱喻結構，詩人表達了自身在時代中生存的孤寂之感，並使得〈詠懷古蹟〉的結構內涵更加的複雜與多樣。因此，綜觀杜甫〈詠懷古蹟〉五首，可以觀察到其中清晰的「以史喻志」之隱喻結構。

三、「非史詩式」的結構義涵

〈詠懷古蹟〉五首不能將之歸類於單純的偏重轉喻性「史詩」，因為綜觀其「以史喻志」的內在深化，基本上具有隱喻結構的性質。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討論〉中談到敘事的意義，曾經這樣說到：

……分佈聯繫不足以說明意義，那麼，要進行結構分析，就必須首先區別多種描述層次並從等級的（結合的）觀點去觀察這些層次。²²

敘事性的作品存在著描述層次的問題，這樣的層次感顯然所指的是結構義涵。羅蘭巴特認為「敘事存在於神話裡，傳說裡，預言裡，童話裡，小說裡，史詩裡，歷史裡……。」²³。然而實際考察文本，無論是小說或詩，應當都存在著廣義的敘述性層次（結構義涵）問題。司格勒斯在《符號學與文學》中談到詩歌閱讀的方式，必須還原其文本中省略的因素。²⁴而在還原的過程中，事實上我們正對文本的結構義涵提出統攝與分析。「結構空白」²⁵的問題不只存在於小說等文本中，詩歌中亦存在這樣的問題。而還原詩歌中的結構空白，有助於我們覺察詩歌結構的完整性。並透過對詩歌文本的層次剖析，進一步釐清諸多問題。回到杜甫〈詠懷古蹟〉的文本考察上，若將〈詠懷古蹟〉五首分別獨立來看，〈詠懷古蹟〉五首中每一首都包含了所謂敘述性的層次問題。這樣的敘述性層次，基本上是圍繞著詩人所詠之歷史人物及其所在舊跡。若以結構來考察，我們很容易觀察到類似「史詩」的轉喻性結構，關於這個部分，前文已經論析過，這裡則不再詳述。這裡要說明的是〈詠懷古蹟〉五首的整體敘述層次問題。

趙遷《唐七律藝術史》曾提及歷來對〈詠懷古蹟〉五首結構的探討。有人抱持前三首及後兩首應分作兩部份來看，如浦起龍的《讀杜心解》²⁶，而楊倫《杜詩鏡詮》則認為〈詠懷古蹟〉五首當作一整體結構看待。而無論是楊倫或是浦起龍的見解，這其中所牽涉到的關鍵問題，都在於對〈詠懷古蹟〉五首整體敘述層

²² 同註12，頁478。

²³ 同前註，頁474。

²⁴ 同註3。

²⁵ 《敘事學》，胡亞敏著，頁228。〈第三章·第五節結構閱讀〉論及結構閱讀的方式，包含重建深層結構，發現結構中的空白，尋找結構中的矛盾等。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武昌，1994年出版。

²⁶ 轉引自《唐七律藝術史》，同註21，頁103。

次的認知。以下本文嘗試重新以圖表考察〈詠懷古蹟〉五首之敘述層次：

整體敘述層次	所詠歷史人物	隱含於敘述性之下的象徵意義
第一層	庾信	漂泊支離
第二層	宋玉	不為世用
第三層	昭君	入宮見妒
第四層	劉備	君臣相契之理想
第五層	諸葛亮	國衰難振

若就〈詠懷古蹟〉五首之整體結構進行考察，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以聯章形式的不可分割性。這樣的不可分割性，在於其敘述層次的分明。並且此一敘述層次呈現出〈詠懷古蹟〉五首「非史詩」的結構義涵，這樣的結構義涵介於「抒懷」與「詠史」之間，並以歷史人物舊蹟作為全詩主要的象徵，而其終極目的則是詩人的自我抒懷。〈詠懷古蹟〉五首的整體敘述層次基本上是以其「非史詩」結構義涵作為主體，這樣的結構義涵，正是詩人以自我為出發的主觀抒懷。隱藏在敘述層下的〈詠懷古蹟〉五首，其所彰顯出的詩人情懷，基本上被隱藏在「史詩性」的轉喻中，但若考察〈詠懷古蹟〉五首之整體結構，我們可以發現詩作中的空白結構，正是杜甫賦與單一歷史人物的象徵意義。這樣的象徵又與詩人自身感懷交錯並峙，進而形成〈詠懷古蹟〉五首整體的隱喻意義。此一隱喻意義強化了詩人的抒懷感嘆，以詩歌的象徵性與隱喻性召喚讀者，使讀者感受到〈詠懷古蹟〉五首背後所隱含的作者個人情懷，並使詩作呈現出一種「非史詩」敘述性的結構義涵。這樣的「非史詩」敘述性，隱藏在看似具史詩意義的敘述層次下，並投射了詩人強烈的個人情感遭遇及抒懷於其中。

肆、結論

魏晉以來的聯章詠懷詩作，幾乎已經形成某種傳統。這樣的傳統基本上是以文人抒情為中心義涵的。而杜甫的〈詠懷古蹟〉五首，在既有的前人基礎上，開創其七律聯章形式的特殊藝術成就，並賦予詩作強烈的個人抒懷情感。透過歷史人物的象徵性義涵，並以敘述性的方式連接，隱喻詩人個人處於時代當中的流離與哀嘆。王嗣爽在《杜臆》中說〈詠懷古蹟〉五首：「借古蹟以詠懷，非詠古蹟

也」²⁷。〈詠懷古蹟〉五首在本質上確實是詠懷抒情之作，這一點前人以多有論及。然而，對於其結構細部的推理及考察，似乎仍顯得不足。因此，藉著對於〈詠懷古蹟〉五首整體之結構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看似「史詩」性質的轉喻性中，實際上則隱含了詩人以歷史為象徵的強烈隱喻。這樣的隱喻所呈現的正是詩人個人的強烈抒情，以及對於自身遭遇及時代矛盾的感傷。透過「以史喻志」的方式，進而呈現詩人背離人群的寂寞，這樣的寂寞，只有在詩人穿透歷史，尋找過往時空中與自身相契的生命靈魂，方才得到安慰。

〈詠懷古蹟〉五首的整體結構不是單純的詠古蹟，但它也不是純然的抒懷，而是交錯在照見歷史蒼茫之感與個人情懷的特殊地帶。在〈詠懷古蹟〉五首分別單篇的詩作呈現中，〈詠懷古蹟〉五首各自表現出接近「史詩式」的敘述性，但若將每首單篇組合成聯章的形式來看，〈詠懷古蹟〉五首所帶有的強烈象徵抒情，基本上是屬於一種「隱喻性」極強的抒情結構。這使得〈詠懷古蹟〉五首不論是在結構或是內涵意義，都呈現出深刻的藝術性。並透過聯章詩體此一特殊形式的反覆演出，深化了詩人所欲表現之主題以及震盪情感。這在同時代的律詩表現中，無疑可說是杜甫十分特出的藝術成就。

²⁷ 轉引自《唐七律藝術史》，同前註，頁104。

參考書目

- 杜甫、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一一三冊、里仁出版、1980年。
- 楊倫編釋、《杜詩鏡詮》、華正書局、1989年。
- 胡豈凡、《杜甫生平及其詩學研究》、文史哲出版、1978年。
- 鄭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文史哲出版、1987年。
- 許總、《杜甫律詩攬勝》、聖環出版社、1997年。
- 劉中和、《杜詩研究》、益智書局、1970年。
- 蕭滌非、《杜甫研究》上下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
- 傅更生、《杜甫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幼獅文化出版、1985年。
- 朱東潤、《杜甫敘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中國唐代文學協會主編《唐代文學研究》五、六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1996年。
- 傅紹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文津出版社、1999年。
- 余恕誠、《唐代風貌及其文化底蘊》、文津出版社、1999年。
- 正中書局編、《唐代詩學》、正中書局印行、1967年。
- 趙謙、《唐七律藝術史》、文津出版社、1992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中冊、木鐸、民國71年、1999年。
- 羅錫詩、夏晴編著、《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中山大學出版社。
- 駱玉明等著、《南北朝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 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隋唐卷》、北京師範學院出版、1993年。
- 趙毅恆、《文學符號學》。
- 羅伯特·司格勒斯、《符號學與文學》、結構群出版1989年。
-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1994年。
- 羅鋼著、《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荷)米克·巴爾、《敘事理論導論》、中國社科院出版、1995年。
- 王泰來等編、《敘事美學》、重慶出版社、1987年。
- 胡經之等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編選》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 Terry Eagleton 著 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書林出版社、1983年。
- 許清雲、《近體詩創作理論》、紅葉文化印行、1997年。
- 陸侃如等編、《中國詩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